

【特约稿】

DOI: 10.15986/j.1008-7192.2017.05.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代际传承研究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论域

马启民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代际”方法是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必不可少的向导,不同“代”展现出时代发展的逻辑,用“代际”分析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传承,有助于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时期“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于各自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呈现出不同特质:第一代凸显其独立探索的启蒙品质;第二代开启实践探索的品格;第三代充满着理论旨趣,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第四代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教育,成为坚定而成熟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相同时空中的交错存在引发其内在张力,展现出代际间的传承与互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连续性发展和创新性突破。

关键词:代际;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G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7)05-0001-09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大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思想浮光掠影,积压已久的诉求冲破沉闷的暗夜涌现出来,或进步、或陈腐、或肤浅、或杂乱……然而,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中心一环,马克思主义以其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最终占据了这一中心位置。迫切寻求救亡之道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历经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星火相传,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

一、代际研究方法及其介入思想史的意义

1. 代及其划分依据

“代”即指处于社会历史维度同一位置,受共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具有类似精神结构和行为样式的同时代人。由此可见,代既具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这是代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一,“代”问题起始于生命的自然周期,代际的自然更替决定了代问题本身的存在。实证主义者

非常重视“代”作为恒常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即“代际更替”是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动力之一,生命的繁衍、更替、保证了人类历史的延续性。其二,“代”始终是特殊社会位置的“代”,具有特定的经验与思想模式,其实质性内容决定于社会结构变迁和历史事件,因此代同时具有社会属性。曼海姆认为:“同时代人都体验了从流行精神、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主流影响,这种经验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成长早期、形成时期,而且也表现在他们的成长晚期。他们是同时代人,构成了同一代,这是因为受到了相同的影响。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意味着受到了相同的影响,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顺序问题。”^{[1]56}因此,“代”的逻辑起点不仅在于其自然属性,更在于其社会属性。

代的划分依据必须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以其社会属性为决定因素。第一,具有相仿的年龄。这由代的自然属性决定,代际之间的年龄差为10岁左右。第二,在成年时(17~25岁)具有共同

收稿日期:2017-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研究”(13BKS017)

作者简介:马启民(1953-),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E-mail:qiminma@163.com

社会经验,不同于前一代人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成长体验决定了他们不同于前一代的历史性格,包括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价值尺度、人生观念等。这由代的社会属性决定,是代际划分的主要依据。因此,同一代人的年龄虽然相近,但历史性格不一定相同;一代人年龄可能相差几岁,却由于受到共同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成为一代人。也即“代际”问题研究专家玛格丽特·米德指出的“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思想。

2. 代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代”在相同时空中的交错存在引发的代际互动和传承

浪漫主义代表狄尔泰指出,不仅存在代际的依次更替,更重要的是不同代的并存,这比纯粹的时间顺序更重要。不同代人由于年龄的差异有不同的社会人文和物质环境,接受不同的教育,围绕着不同的时代课题,进而表现出彼此的异质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同时连续的几代人又会出现于相同时空的交互关系,因此而发生代际之间的交流、影响、冲突,导致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代问题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代际冲突”,不同代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视域下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应、冲突;另一方面,不同代人在同一时空发生交互关系,决定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因此,代问题在于挖掘“代”之间的相互承接关系和相互区别的内在动因,从而透析一定视域内时代发展和思想变迁的内在轨迹。

3. 代际理论介入思想史的有效性

“代问题是重要的,也值得对其进行严肃的研究,该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向导。如果人们想要对我们时代中越来越快的社会变迁特征有更准确的了解的话,那么此问题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1]60}曼海姆的这段话清晰地揭示了代际分析对于探索一个时期社会思想发展脉络的特殊意义,尤其对于研究历史骤变期的思想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代问题使我们能够接触到人类存在的某些终极因素。基于“代际”划分方法对于研究思想史的重要意义,近代以来的一些思想家曾以“代”的研究方法梳理思想史,探求思想发展的轨迹。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将他所经历时代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洋务运动一期”、“维新变

法一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期”,并论述了每一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特点,并阐述了他们的新陈代谢。这里虽然没有用“代”的概念,却实质上是代际的分析方法。鲁迅曾经设想写一部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其中有“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和“抗战一代”^①。李泽厚在此基础上往后加了“解放一代”和“红卫兵一代”,认为“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艰难悲惨地走过了五分之四的二十世纪”^{[2]278}。李泽厚先生曾打算以六代人为中心展开现代思想史的论述,但遗憾未能如愿。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专家许纪霖先生也试图以代际方法研究20世纪的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认为“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3]86}。通过代际划分,急速变迁和跌宕起伏的思想史脉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每一代知识分子展现了时代赋予他们的特点、教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思潮的主流,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代际分析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思维路径。通过分析几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同特质和代际之间的传承和互动,有助于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和创造性,从学理上深度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源起和发展轨迹。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及其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阶段,又是中国社会不断增长新的因素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又是以代的形式展现的。依据“代”的划分理论和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独特的发展轨迹来看,可以把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划分为四代,即

“辛亥后的启蒙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和“抗战的一代”。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成年时（17~25岁）分别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不同的时代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品格。几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他们独特的理论视域、思路和实践承担着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

1. “辛亥后的启蒙一代”

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与时代转变的产物。由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的思想承担者就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家。这一转变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虽然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但他们思想积淀的深度和成熟度完全不同，是与其年龄、阅历、经历和对新旧时代的反思深度相联系的，这也正是一种“代”的意义和特点使然。由辛亥革命到“五四”时代的觉醒，从思想脉络来看，是一代人身临其境反思的结果，是一种由旧到新的成熟反思的过程。没有一个长期的思想的积累、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积淀，对旧民主主义的失望与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敏感、学习、领悟、思考和信仰，决然不会有在重大思想转折关头的坚定和清醒，也决然不会在那个思想纷繁变化的年代作为思想领袖的担当。这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毛泽东把陈独秀称为“总司令”，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那个时代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堪称“思想启蒙的一代”。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有其鲜明的特征，且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

第一，启蒙精神和批判精神。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所处的时代特点，显示出独立的人格，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发起新文化运动，在沉闷的思想暗夜中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理性口号。他们坚持独立思考的科学理性精神，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作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是求索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当代学者侯才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求索中国现

代性，首先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理论之中，特别体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中。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通过‘科学’和‘民主’的要求表达出来的，具有现代性底蕴的主体性精神。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从经济、政治和观念形态的文化等不同层面，全面呼唤主体性，标志着中国哲学主体性的觉醒与实践启蒙。”^[4]“民主和科学”主体性的觉醒在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它不但使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依据其理性精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也成为尔后在道路选择中不盲目照搬外国模式的思想源流之一。陈独秀虽然在大革命时期犯了错误，但其独立思考的精神并没有改变。“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在1940年7月至11月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等信件和文章中，陈独秀阐述了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尖锐地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应该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民主政治的问题，并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不可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可以说，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最深刻的思索，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5]对陈独秀的思想贡献，应该从哲学主体性的角度上给予思考，对这种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不能狭隘地简单地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角度给予解答。其基于主体性的批判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开拓者。

第二，追求真理，系统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率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开始系统研究、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民主和科学”主体性觉醒的条件下选择的结果，是对世界大势和中国问题反思的结果，是对各种理论比较研究的结果，是一种真理性的追求，是启蒙精神的延续。关于李大钊的作用，李泽厚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这样评价：“1919年5月李大

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可说是第一篇真正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文，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2]152}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最高水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了一代青年学生。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起了开创性、引导性的作用，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和自我的探索中成长起来的。

第三，从理论到行动，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理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把理论付诸实践，成为行动主义者。陈独秀不但自己投身于政治之中，也号召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由启蒙转向救亡。陈独秀是知识分子，更是革命家。他创办《新青年》，组织建党，领导五四运动，投身于国民革命，始终站在时代和革命的最前端。与此同时，他密切联系青年知识分子，号召他们积极参与革命，培育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优良传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一批知识青年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陈潭秋等都曾谈到陈独秀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6]105}李大钊提出“到农村去”的思想，号召文化青年“到农村去”。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据了劳工阶级的大多数，如果农民不解放，那么全体国民就不会解放^②。这一论述既是把理论付诸行动，也是对中国国情的一种把握，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思想。

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群众，从民主和科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理论走向革命实践。他们的政治激情和启蒙精神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一代人，培育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遗憾的是，1927年李大钊英勇就义，而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使年幼的中共遭受挫折。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开辟了道路，培养了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留给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2. “五四的一代”

“五四的一代”出生在1895年前后，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热心读者，是受陈独秀、李大钊影响最密切的群体。“五四的一代”的主要代表有瞿秋白、毛泽东、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陈翰笙、周恩来、蔡和森、彭湃、邓中夏、恽代英、刘少奇、邓小平、鲁迅、许德珩、邓初民等。这一代人的构成比较复杂，其中鲁迅年龄较长于同代人，但因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较晚，也属于这一代。而邓小平虽然年龄较小于同代人，却因较早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也属于这一代。

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知识分子是开拓的一代，最突出的特征是实践品格。第一代“科学与民主”的批判精神和追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要体现在实践的路径上。在实践中批判、在实践中验证、在实践中建构和创新成为时代赋予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必然使命。他们这一代既具有理论家的特质，更具有实践家的品格。

首先，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落实于具体的行动，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实践的武器和革命的力量，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他们继承了第一代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精神，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他们很少沉溺于纯理论的研究，而总是从实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莫不如此。他们不但学理论，还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军事，学会打仗，学会做革命的领导与组织工作，使年幼的中共迅速成长起来，担负起救亡的历史重任。他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们成为了具有丰富实践基础的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影响了之后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并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脉络。

其次，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辟了在实践中创新理论的探索路径。他们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使其上升为新的科学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是其中杰出

的代表。毛泽东把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军事等实践问题上升到哲学理论形态上来论证，他从实际出发，重视事物的特殊性，沿着从特殊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路径，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李泽厚指出，“毛泽东这些哲学思想主要是依据他自己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上升而来。”^{[2]182}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

再次，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了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思维方式的转变。第二代不是仅仅埋头于实际工作的实践家，而是具有高度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理论家。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进程的探索中，融合中西两种视界，以实践为基点，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法则，创造性地构建了实践的认识论、实践的辩证法和实践的历史观的统一整体，实现了哲学立场和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维度的首要性和重要性，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哲学。王南湜指出：“毛泽东的哲学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实践哲学”。在这一实践哲学的指导下，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实践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以实践哲学的精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7]199}这一品格也内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和鲜明特征。思维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启蒙思想由主体启蒙到实践启蒙的转变。如果说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开启的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启蒙是以主体的解放为特征的启蒙的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二代则是以实践为特征的启蒙。一切终极的思想、一切理性的原则都必须在社会实践的砝码上给以衡量和检验，这一思想解放的新传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主流形态。

基于代际的传承规律，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对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领军作用，影响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思想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如李达、陈翰笙、郭沫若、鲁迅等。由于时代特征和知识分子主体特征的双重因素，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成为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核心领导群体，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

3. “大革命的一代”

3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彷徨的年代。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尤为明显，因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上承担起解除迷雾的责任。第三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经历了大革命，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而来的白色恐怖中成熟起来。可以称为“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出生在1905年前后，陈伯达曾对这一代人形象地指出：“我们都是‘五四’的儿子，都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后大革命的儿子，过去的先觉们已给我们开了多少的道路，我们现在就是要继续他们开辟的工作，并去完成这工作。”^{[8]52}“大革命的一代”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困惑、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成熟起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伯达、张如心、张岱年、艾思奇、杨松、孙治方、沈志远、张闻天、柳湜、何干之、侯外庐、吕振羽、华岗、薛暮桥、叶蠖生、周扬、胡风、冯雪峰、夏衍、陈昌浩、钱俊瑞、王思华、张仲实、吴亮平、李平心等。

“大革命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理论与学术的旨趣。

第一，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旨趣，开辟了从学术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径。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引进阶段，进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的深化阶段。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特质是走从学术的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即是说，从学术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路径。这一路径，绝不是在书斋里抽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思想学术战线上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天地。与第二代相比，他们更具理论研究职业化的色彩和角色，具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科。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一些学者甚至被捕入狱，如薛暮桥、华岗等，但他们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和执着的学术理论探索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起来,他们在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为马克思主义开拓地盘和领地。一批具有专业学科背景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纷纷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长与聚集起来,他们大都以当时经济文化集中的城市为中心,以左联、社联等进步理论团体为依托,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理论宣传和研究活动。他们不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更作为研究方法和分析事物的工具,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开启系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理论研究。他们的努力不仅成就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又一轮高潮,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李泽厚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对不同代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无论是陈独秀1923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或是毛泽东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主要是从当时整个阶级斗争、情况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因此,着眼点和着重点主要不在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究”,“直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才有了初步的科学研究”^{[2]159-160}。

第二,在学术上彰显了个性。这一时期处在不同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论是党的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或是左翼人士、或是大学教授、职员、自由职业者、亦或其他劳动者,在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领域,独自研究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李维武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形态问题时指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通过各自的个性化的探讨,以不同形态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多彩的色调和多样的形式,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活力和理论魅力。”^[9]

第三,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派。面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学术盛行的局面,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围绕史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中的问题展开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研

究和讨论,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成就最突出的学科,在郭沫若开创了以唯物史观为依据描述和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后,吕振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二个奠基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此外,华岗、侯外庐、何干之、李平心等一批专业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理论逐步深入,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以李达、陈伯达等为代表的哲学理论工作者,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中国式的理论建构和解读,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哲学思想和重估中国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奋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以沈志远、钱俊瑞、孙治方、薛暮桥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的带领下深入中国农村,搜集第一手资料,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和农村经济学。在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瞿秋白、鲁迅等的影响下,以周扬、冯雪峰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积极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地位。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中展开,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创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做了很高的评价,把这支队伍称为文化生力军。他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0]697}党中央到达延安后,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也陆续到达延安,进入中共思想文化界,成为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好帮手，也成为培养第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骨干力量。

4. “抗战的一代”

第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出生于1915年前后，他们的成长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剧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成长起来。第四代的代表人物有胡乔木、陈唯实、金灿然、邓拓、乔冠华、胡绳、田家英、何锡麟、于光远、邓力群、何其芳、陈荒煤、周而复、吴冷西、宋涛等。

第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成长的一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和宣传者。他们沿着前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创的理论视域和实践路径纵深前行。

首先，他们与前三代在知识结构上有较大的不同。李泽厚在分析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时指出：“从瞿秋白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到艾思奇《大众哲学》的通俗宣传，的确在普及这种新的世界观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使年轻一代不必再像上代人那样，经由达尔文的进化论走向唯物史观，而是直接由此而接受、信仰这既普遍适用又非常‘科学’的对宇宙、自然、社会各种现象的解释，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引导人生、参加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与其他各派现代哲学唯心论划分界限。这就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2]171}“在一定程度上和意义上，这也是艾思奇《大众哲学》与李达《社会学大纲》的差异所在。”^{[2]171}抗战的一代其知识结构和基础一开始就不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体现了新一代的特点。其思想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致。

其次，在延安接受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他们的世界观和学术研究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延安时期成长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对他们影响最深。而影响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实事求是的学风，二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这种精神集中体现

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身上。田家英是一位才思敏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脱颖而出，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第四代人物的代表。他的品质和风格，据逢先知回忆，“在田家英的一生中，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最深的，主要是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是实事求是。这也贯穿在他的一生中，并因此而做出牺牲。……在各种政治风浪中，他所以能够坚持正确方向，敢于同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以及某些邪恶势力进行无畏的斗争，无愧于为一名诚实的共产党人，主要靠这两个基本观点作为思想支柱。”^{[1]17}

再次，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的主体，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做出重要贡献，成为党的理论宣传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任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如金灿然、于光远、何锡麟等。他们还通过编写教材，讲授课程的方式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胡乔木在延安工作期间就曾协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1944年5月，邓拓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从1946年5月开始，各解放区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他们配合前两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边区建立了大批培养干部的红色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并在学校授课，从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

第四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奔赴在各条理论战线上，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人力资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使他们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坚力量。

三、 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传承和互动

“代现象是产生历史发展动力的基本因素之

一。在此问题中,对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分析,历史发展的特征就不能被正确地理解。这一问题解决的基础只能是一种对其所有组成因素严格和仔细的分析。”^{[1]82}具体时空的代位置的相异和宏观时空中几代人的并存构成了代际之间互动和传承。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仅要研究每一代的特点,更要深入探究各代之间传承和互动的内在张力。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成长起来,几代人所处时空的交织形成了他们之间的频繁互动。

1. 代际之间的内在张力决定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关联和互动,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就在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适合的发展路径。李泽厚讲到:“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在于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2]163}“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分别从实践和学术两个层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路。一方面,“五四的一代”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从自己丰富的实践及经验教训中经过理论思维和理论斗争达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形成了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展开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发生了良好的互动,“五四的一代”政治层面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对理论工作者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启发和引领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而理论工作者在学术层面的开拓和建构,从知识和思想方法的角度拓宽了认识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并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铺垫了认识问题的基础,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升华起到了积极的学术支撑作用。比如,艾思奇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思想方法论》一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某些方面的形成起到了学理支撑作用。据石仲泉考证,毛泽东通过读艾思奇著作《思想方法论》,了解到哲学就是思想方法论的学问,这对他

影响深远^③。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学术性知识分子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理论成果创新最为集中的时期,第二代和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频繁互动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与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践行了对这一成果的诠释和传播的使命。

2. 代际之间通过授课、著书撰文、宣讲、推介等非日常和日常的交往方式实现理论传承

代的生物延续性和代际更替成为文化延续的基础和前提,老一代和新一代在时空上的交错存在也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传授和交流。其中,师生关系是代际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曾担任教育工作,培育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李达不仅通过《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等著作的发表,影响了第三代和第四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培养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就是李达的学生,受李达影响,吕振羽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李达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从社会构造、起源、发达、变革以及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结合部分历史实际,阐述了唯物史观一系列原理,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高水平,直接影响了吕振羽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学者。”^[12]在李达的帮助下,吕振羽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整理和阐释中国思想通史的名著。其中的学术思想与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的方法论原则高度一致,可以说李达为吕振羽传授了整理与阐释中国哲学及其思想的基本方法。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之在根据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一大批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在他的培养熏陶下成长起来,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涛就是何干之的学生。宋涛回忆说:“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其学术风格与正直的人品一直影响着我,是我学习的楷模。”^[13]这种学术传承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代际更替。

3. 不同“代”在相同时空中的交错存在引发的内在张力还表现为连续几代人的差异与相互间的反思与超越

正如曼海姆所言:“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节奏越

快，处于特定代位置的群体越有可能通过产生其自身的实体而对此变迁环境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变迁节奏过快会摧毁处于萌芽状态的实体。”^[1]⁶⁰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连续几代人的奋斗中，一方面表现出开启、继承、发展的演进特征；另一方面在实践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双重变奏中，也表现出反思、批判、纠正、完善的理论特征。四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各自实现与发挥自己一代的历史作用，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参 考 文 献

- [1] 卡尔·曼海姆. 卡尔·曼海姆精粹[M]. 徐彬,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3]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4] 候才. 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国当代当前哲学发展概观[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4(1): 9-14.
- [5] 郭德宏. 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J]. 党史纵览, 2005(1): 35-38.
- [6]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 董乐山,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 [7] 王南湜. 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8] 陈晓农.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M]. 香港: 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 2006.
- [9] 李维武.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形态[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2): 10-20.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董边, 谭德山.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 [12] 蒋大椿. 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J]. 历史教学, 2000(6): 5-10.
- [13] 宋涛. 我的老师何干之[J]. 炎黄春秋, 2006(9): 30-31.

A Study on the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In the discourse domai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MA Q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study, the essential guidanc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d spiritual movements, reveals the logic of epoch development. To study the theory inheritance of Marxist intellectuals by this means is helpful to deeply interpret the Marxist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In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 four generations of Marxist intellectuals grew up in the unique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respectively, thus presenting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generation showed the enlightening quality to explore independently,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started a new character to embark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Filled with theory purport, the third generation was dedicated to the academic study of Marxism, and having systematically received the educ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fourth generation, firm and mature, becomes a new generation of Marxist intellectuals. The overlapping existence of these four generations in the same period enhances the inherent tension and reveals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interaction, henc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Marxist theory's continual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breakthrough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 Marxism; intellectuals; new democracy

【编辑 王思齐】

注释:

- ① 其思想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80页。
- ② 李泽厚在《试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引用李大钊的文章《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提出这一观点，并认为这一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详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63页。本文认为这一思想是李大钊基于中国实际的思考，而非民粹主义。
- ③ 此观点源自石仲泉的文章《延安时期的艾思奇哲学与毛泽东哲学》载《理论视野》2008年第6期。